

容闳政治思想述评

李 晓 明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人,是我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者。他自幼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后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毕业以后,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国内。他参加过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结下了长达20年的深厚的关系。他曾经亲自率领第一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开始了中美之间文化交流;他曾亲自赴美购买机器设备,开创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创办近代工业的先河,对洋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戊戌变法时期,他回国参加了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后又参加唐才常领导的“张园国会”,并担任了第一任会长。晚年,他支持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909年在美国出版了他用英文写的《西学东渐记》一书,系统地描叙了他为中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一生。

容闳的一生始终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进步。他的爱国思想和社会实践,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都产生过积极影响。虽然他未能形成完整系统的政治理论,但从他所提出的种种维新方案和建议中,从他的《西学东渐记》中,从他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可清楚地见其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本文试图从爱国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教育救国思想、政治主张等几个方面概要地叙述他的政治思想。

一、反侵略的爱国思想

容闳的爱国思想是贯穿他的政治思想的一根主线。在他的心目中,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保卫祖国,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哪怕牺牲个人,也在所不辞。

容闳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于他坚决揭露、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对于西方列强入侵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他有着深刻的认识。为了唤醒民族自觉,他向朝野大声疾呼。1868年,他曾上书清政府,指出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危害不容忽视,“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几有管辖之权”^①。要求清政府严厉制止传教士在华活动。1874年,他发动在沪粤籍实业家集资万两,筹办中文报纸《汇报》。该报为避免清政府干预而聘清英国人葛廷为挂名主笔,但其爱国立场却是十分鲜明的。该报在8月25日的社论中明确表示:“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而言之,故有利于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②。在后来涉及上海修筑铁路权力问题上,它同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申报》展开了论战,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尽管该报很快在中外反动势力压迫下停办了,但它在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外国侵略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容闳是较早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威胁的人。1874年5月8日,日本阴谋侵略我国台湾省,派兵在琅琦港登陆。他马上协助上海海关道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提出抗议,并向支持日本行动的美国驻厦门领事及美国海军官员提出抗议。随后,在赴美途中经过日本时,他又将所探日本将发兵台湾的消息寄回天津洋务委员许亮才,托他转告清政府,并建议清政府派官员到日本、美国等国去据理力争,以阻止日本侵略台湾。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当时正在美国的容闳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向清政府提出抗击日本侵略的两项建议:第一,是向英政府借款1500万元,购买铁甲舰3—4艘,雇用外籍兵5000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后路,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第二,将台湾全岛抵押给欧西任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作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的军费^③。他的建议,一方面反映出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在此时仍然没有摆脱洋务派“以夷制夷”思想的框框。当时西方列强在期望日本能打败清王朝,以便于他们对中国的宰割。但他仍然幻想依靠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抗日本,这最终只会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然而从他的出发点讲,这种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积极练兵备战的爱国精神是应当肯定的。

面临西方列强瓜分之祸,容闳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的战略思想。他建议清政府尽快地建立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的海军和陆军,这样就能在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面前立于不败之地。为用新式武器装备清军,1873年,当他得知美国生产了最新式的格林大炮消息以后,专程携带炮样从美国赶回中国,要求清政府订购,经李鸿章同意,购买了价值10万美元的50门格林炮装备清军;1878年,他又和叶源濬、容增祥一起捐款购买了一批枪炮弹药,装备清朝军队。这些新式武器的引进,对清朝国防近代化,对反侵略战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容闳的爱国思想都表现在保护海外华侨和华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上。1875年12月,他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的副公使(陈兰彬为正公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派驻这些国家的第一任公使。在他担任外交官的生涯中,为保护华侨和华工的正当权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1847年,秘鲁使臣来华要求与清政府订立招募华工的协定。当时容闳亲自参加了由李鸿章主持的与秘鲁使臣的会谈。在会谈中,他历数中国华工在秘鲁的惨状,义正词严地指责秘鲁政府贩卖、虐待华工的野蛮罪行。秘鲁使臣极力狡辩。为了拿出真凭实据,他又密往秘鲁查访华工情形。他集录了数十名受害华工的呈词,又得到美国驻秘鲁公使及居住在秘鲁的美国侨民的信函、证词等文件,另附以24张照片,“凡华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乃藉此摄影,一一呈现于世人之目中。”^④当清政府拿出他提供的证明材料后,秘鲁使臣“噤不能声”,不得不承认华工受迫害的事实,并一再保证要用“实力保护”在秘鲁的华工。自他提供了秘鲁华工情况调查报告以后,清政府“始悉该国虐待华工至于犬马”的惨状,而于1875年正式宣布禁止澳门的“苦力贸易”,并决定派出驻秘鲁、古巴等国的使臣,对该国的华工进行保护。

1879年和1880年,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华侨财产被毁坏,侨民无故被打

死，华工遭受残酷迫害。容闳以公使身份多次照会美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1879年10月，他照会美国国务卿，反对美国政府虐待华侨，勒索重税，指出美国税务司重征华侨的税收，是“有意禁阻华商生业，实与两国所立条约之不符”^⑤。1880年2月，排华浪潮进一步发展，他再次向美国国务卿抗议排华罪行，指出：“近来旧金山华人被侮情形，日甚一日，势处危迫，……十年来华人被侮之案，殴击凌辱，甚至焚毁残害，层见迭出，沉冤获雪者，能有几何？”^⑥他要求美国政府遵守中美续增条约的规定，制止排华事件的继续发生，切实保护中国侨民的权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实业救国的思想

容闳认为唯有一个在经济上强大的中国，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强大，才有可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发展经济的建议和方案。

第一，提出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初步方案

在容闳的维新方案中，并未提到大机器工业的内容，但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中国旧有的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是他实业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引进西方现代化机器设备，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第一步是建立机器制造工业，也就是他向曾国藩建议的办“机器母厂”的计划。他认为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以通用的和基础的为主的机器厂，“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既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⑦这样就可以使中国工业摆脱依靠进口机器设备的被动局面，取得独立自主的条件。而且还要利用比欧美廉价的多的中国原料和劳动力，生产出比欧美廉价得多的民用商品，与外国竞争，以抵制外国商品的输入。他的建议是中国最早的工业近代化建设的方案，它与洋务派单纯发展军事工业以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为实现这一计划，容闳亲自奔赴美国购买所需的机器设备，于1865年购回各类机器一百数十余种，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这批机器设备就成为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基础。他从欧美购回的机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也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端。

第二，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方案

容闳在提出建立中国近代化工业的方案以后，更进一步提出建立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868年，他向清政府提出组织只收华股，不许外国人入股，经理、职员一概聘用中国人的纯粹华资的轮船公司的建议，以便与垄断长江航运业的旗昌洋行等外国轮船公司争利。而在前一年，他在上海筹建一个由纯粹华商集资的轮船公司，正式拟定了章程，呈报总理衙门批准。公司“但用中国人合股而成”，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基本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进行。然而他的活动和建议一样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加上集资的困难而未办成功。

容闳亲自拟定的华商轮船公司章程，是中国商人提出的第一个轮船公司章程，也是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第一个章程，它代表着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和发展中

国的民族工业的要求；他提出了商办企业的要求，以打破洋务派垄断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局面；它还有通过自由竞争来发展中国的民族航运业和商业，打破外国洋行独占中国航运业的局面，与其争夺利权的爱国思想。这个章程为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后来的轮船招商局基本上是在这个章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容闳还积极支持和扶植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当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抱着与外国资本进行“商战”的思想，接手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遇到困难，要求他帮助时，他积极、热情地予以支援，为郑观应聘请了美国人丹利，协助他规划建厂，使他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办厂的工作。

第三，提出了创建国家银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建议

银行是为解决生产部门所必需的而又一时难以筹借到的大笔资金而诞生的，它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发展的产物。对于从美国回来的容闳来说是深知银行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他也从自己创办轮船公司的筹款活动中深感中国资金筹集的困难。因此，他曾经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创建国家银行的建议，也同清朝官员就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与人合作，将1875年美国国家银法律和其它有关法律译成中文，作为他起草中国银行律例的基础文本，然后又制定了详细的国家银行计划。这就是《请创办银行章程》（内分银行总纲四条、总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和《续拟银行条陈》，他提出由清政府预筹资金一千万两，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费，并且详细计划了具体的开支情况和创办事宜，指出俟“将来国家工商业发达了，国家银行亦随之逐年增加其资本”^⑧。他创办国家银行的着眼点是很明确的，它以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为目的，由国家银行用资金的组合与调拨来解决民族资本在资金方面的困难，以保证民族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当他把这一详细的创办国家银行的计划呈交给时任总署大臣兼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户部尚书翁同和时，深得他们的赞许，并将此计划“遍示部中同僚，征求意见，”“部中重要之数大员……称赏不置”^⑨。上报朝廷，眼看计划就要被批准了，忽横生枝节，被大买办盛宣怀用犒金30万两，賄买二三亲贵及政府中重大人物，而使计划破产。原来“筹备设立国家银行之一千万两现银，遂为盛一人攫去，以营其私业”^⑩。

容闳的建议被否决后，颇感灰心与不平。他认为“究国家银行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整个国家贿赂成风，似乎“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者孰得之”^⑪。他一方面为自己一颗报效祖国之心不被人所理解而感到忧愤；另一方面也为清政府的腐败透顶而无可奈何，依靠如此之政府怎么能够实行维新计划呢？

虽然，容闳的建议未被采纳，但是，创办新式银行的思想却为朝廷普遍重视，也为实业家所重视，不久终于有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

第四，提出吸收外资修筑铁路和开发矿产的建议

在容闳的经济思想中，修筑铁路、开发矿产也是他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铁路通则国家交通便利，商业随之兴旺；矿产开，则国家利源广、财政裕。由此，可以使中国“渐臻强盛而不至终居人下”。

② 鉴于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容闳曾提出吸收外国资金的办法来修筑铁路，开发矿山。他指出：如果允许外资帮助中国建造全境铁路，则“利源日开，……五十年不必另贾一文，另创一议，……所借本身可以清还，并铁路胥为我有”⑩。而且还可以消弭资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铁路权益的活动，使中国的路权得到保护。为此，他专门拟写《变通招股》条陈进呈总署，请求清政府允许吸收外资以修铁路、开矿山。在他看来，只要把全国铁路的修筑权出让给资本帝国主义，就可以获得大笔的外资，中国的铁路可得修筑，中国的矿山可得开发，合同期限一到，所借本息可以还清，铁路利权亦悉归国有，不需花国家一分一厘，就可达到目的，何乐而不为？

显然，容闳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他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的冒险计划。历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压迫中国，使中国加速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攫取中国的铁路利权和控制中国的铁路经营，而资本输出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他不可能看到这些危险性，出于救国心切和对西方列强认识的模糊性，他提出了吸收外资修铁路开矿山的计划，实际上是把中国的路矿权拱手交给了帝国主义；然而，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也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维新宗旨，借外资以发展本国经济是他首次提出，修铁路便利交通，促进工商业发展，开矿山、裕财政，都属于维新运动的范畴，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救亡图存，把被帝国主义攫取的路矿权收归“我有”，防止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瓜分，只是他不可能想到他的计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潜藏的危险性，最后只会使帝国主义乘虚而入。

三、教育救国的思想

教育救国的思想是容闳政治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教育救国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容闳是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行者。他把派遣出国留学生当作实现教育救国、改造中国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制度不可能培养出掌握现代化知识的人才，科举取士制度只能培养出那些死背八股文章，毫无经世之用的蠢才。要学习西方，用西学的声、光、电、化、轮船、铁路、电报等专业知识来装备年青的一代，出国留学则是最好的途径；第二，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就需要有一批能掌握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的人才，作为改革的重要力量。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在国内是难的，只有走出国留学的道路；第三，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国急需掌握现代知识的人才担任外交工作。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⑪，甚至“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政、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在同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协商条约中，竟让美国蒲安臣充当中国人的首席代表，那怎么合适呢？”⑫第四，通过派遣出国留学生，可以增进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他指出派官费生出国，

由于学生接受西方教育之知识及经验,增进与外国人民之接触,将有助于中国在外交、商务及工业之发展。他非常自信地说:“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⑮

容闳派遣留学生计划,最早形成于留学美国之时。因为他自己亲身体会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先进,回国以后则大力促成留学运动。1868年1月,他提出了他的以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救国方案,在上清政府的呈文中,他建议清政府“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为国家储备人才”,并附上派遣方法:暂定留学名额为120名,分四批派遣,每年30名;学习期间为15年,学习年龄在12—14岁左右;留学经费从上海海关税下提取;同时可派汉文教习,并设留学监督二人,以保证留学事项顺利进行。这一方案因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丁忧归乡而被搁置。

在留学计划受挫后,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又积极着手创办国内的新式教育。1868年曾国藩到江南制造局参观,看到那么多的新式机器在自动运转,并造出各种军工产品,感到非常高兴,连声称赞。这时,容闳乘着曾高兴的时候,向他建议道:应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给中国青年工人讲授机械原理,并给他们实习的机会,以期将来由中国人完全独立自主地管理这家工厂,使用、修理并制造这些机器,不再仰仗外国工程师。曾国藩听后表示赞同,他兴办实业学校的理想得以实现。不久,这所机械学校就开办了,它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早期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这说明,他不仅注意到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也考虑到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并提出了教育应当为独立自主的方针服务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有见识的进步思想。

自此以后,容闳大受鼓舞,认识到在适当的时候,他的理想有实现的可能。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他利用随行做翻译的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留学的计划,经过丁日昌的游说,加上“天津教案”的刺激,曾国藩表示愿意联名向朝廷奏报。他花了两天的时间,代曾国藩起草了一份奏折,这就是1871年9月3日由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上奏的著名的《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其中详细地规定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条件,回国后的待遇及遵守的规则等。

1872年2月,曾国藩再次上奏,促使官费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具体落实。决定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驻美留学生事务所的正、付监督。招生名额为120名,分四批派遣,每年30名,毕业以后回国,由清政府委任官职,所需经费由海关拨付。自此,从1875年间,先后共派出120名幼童赴美学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容闳为之努力了2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想起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付出的代价,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信心与勇气所受到的严峻考验,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他却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情况下,即使这项计划能够实现,也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他更没有想到,实施这项计划将会遭到封建顽固势力多大的阻挠和破坏。到1881年,由于顽固势力的一再破坏,留美学生被全部撤回,致使多人学业中断,他多年来惨淡经营的事业也告失败。

容闳把改造中国的立脚点放在培养教育人才上,可以说具有战略眼光,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要振兴中国,抵御外国侵略,就应积极向西方吸收先进的科技文化

和仿效西方的社会制度，为此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这才是富国强民的最好办法。而选派幼童出国，学习期限定为15年，其目的在于使这批学生摆脱国内封建意识的影响和束缚，把他们培养成完全与旧式封建文人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使他们懂得世界知识和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能力，成为改革中国的人才。在这一点上，他和洋务派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洋务派是要培养一批略懂洋务而效忠于封建制度的知识分子，回国后为洋务企事业效劳，以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并不希望对中国实行根本的变革。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是导致他最终脱离洋务派的主要因素。

虽然中国第一次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中途夭折了，但这毕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在创办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事业上，容闳功不可没。《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的作者舒新城曾指出：“无容闳，虽不能说一定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生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

四、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

容闳本想依靠清政府实现他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愿望，然而无论是实业还是教育计划最后都夭折了。严酷的现实使他深刻认识到：依靠腐败的清政府实行任何改良都是不可能的。对清政府的失望使他产生了对清朝实行根本改革的想法，政治上的主张也日趋激进，逐步地由“君主立宪”发展到“民主共和”，由依靠清政府走上支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他政治上的主张基本上是沿着“洋务—维新—革命”的线索发展的，而且后阶段的发展较前阶段快得多。

从容闳回国到1881年留学生运动受挫，他基本上活动在洋务派阵营中。从洋务到维新对他来说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利用清政府进行社会改革到对清政府本身进行根本改革，是他对几十年来洋务活动重新思索的结果，也是对清政府反思的必然结果。这一转变，标志着他从一个实业家、教育家成为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活动家。

与洋务派分道扬镳以后，容闳积极参加改良派的救亡图存的维新活动。他积极支持康梁等人所领导的“伟大的维新事业”，成为变法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团体“保国会”的发起集会，他的寓所由于维新人士经常聚集，“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⑩。他还与康梁维新运动领袖过从甚密。他的许多维新思想（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良中国的计划）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康梁等人，并通过康梁等人所上变法奏折中反映出来。他对康梁提出的变法思想和主张，也是同意并予以支持的。康梁等维新派领袖都把他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加以尊重，对他的爱国主张和渊博的学识也很器重，对他所提出的新政建议颇为支持，维新派所办报纸《时务报》就曾全文登载他有关创办银行、轮船、铁路的章程。维新派还积极向光绪皇帝推荐他办理维新事宜。由于他在维新运动中的影响与活跃程度，使他被顽固派视为大敌之一。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在参劾维新派人士时，即把他列为要犯之一。变法失败后，即遭清政府通缉，与此同时，他对清政府的幻想渐趋破灭。

维新运动的失败，并没有使容闳停止活动。1900年，他在上海继续参加由唐才常组织的“国会”运动，并被推选担任了第一任会长。国会成立后，他亲自起草了英文

的“对外宣言”。这个宣言既可以说是自立军的政治纲领，又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公开政治宣言，它反映了他在整个维新运动时期的政治主张。宣言首先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一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府，其次，提出了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并积极部署自立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起义；再次，提出愿意联合西方列强，承认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一切条约，保护租界、教堂及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换取列强对改良中国主张的支持；最后，提出愿意联合维新派、革命派、汉族官僚和其它各派力量以“废黜慈禧太后及老朽的顽固派和反对官僚、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①7}从这个宣言中可看出，他政治上虽然仍旧主张君主立宪制度，但与戊戌变法时期却有所不同，这时主张的是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制，虽然仍要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但权力已被极大地限制；而且他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已经预示着他开始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这也是以后他参加并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基础。宣言的不足，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具体内容没有作更多的描叙，且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再度遭到通缉，被迫亡命海外。1900年初，他在香港避难，经常与革命派人士接触，与他们共同讨论政治形势，共商革命大计。这年九月，他乘海轮从香港去日本，在船上巧遇孙中山，一同至东京、神户、横滨等地，一路上的交谈，使他对孙中山的思想、为人、政治主张、远大抱负有了更深的了解。加上两人都是广东省香山县人，受的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同抱有革新救国的壮志，都走过一条报国无门的路途，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遭遇使他们一见如故。他逐渐的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曾对青年说：孙中山“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助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①8}。鼓励青年们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帮助孙中山完成革命事业。

与此同时，他逐渐地认识到已经倒退为保皇党的康梁等人的思想成为革命事业的阻力，也认识到康梁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危害，毅然地与康梁决裂了。

容闳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首先表现在他积极支持革命派武装推翻清政府的斗争。他积极参加革命派组织的反清活动，他曾参与香港兴中会成员谢赞泰领导的兴中会第三次起义——壬寅广州之役。革命派“向容历陈与洪全福、李纪堂谋在广州发难之种种计划”，并将革命成功后“拥容为首领”等告诉容，容“极首肯”，答应到“美国后尽力相助”^{①9}。虽然“大明顺天国”最终没有建立，然他却是参与并支持了这次起义的。1909年，他曾提出名为“红龙一中国”的计划，准备向孙中山提供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以帮助孙中山在国内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斗争。接着他又把同情中国革命美国人荷马李和布思介绍给孙中山，多次讨论“红龙一中国”计划的具体实施问题。

容闳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政治主张，还表现在他以民主共和国主张代替了君主立宪的主张。1910年3月，他在写给布思的信中第一次详细地谈到了“组织临时政府”的细节问题。在他设计的临时政府方案中，完全仿照美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总统负责制政体，行政最高首长为总统，下设国务卿和各部部长^{②0}。他所提出的这个方案，与孙中山一年之后组建的南京临时政府颇为类似，可见两人在政治

主张上已是多么接近。

容闳由支持改良转为支持革命派，由主张君主立宪到主张民主共和，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在革命斗争中不断的向前发展。

当容闳在美国得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十分关怀革命的进展情况，在他写的致全体革命者的信中，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表示支持，对新生共和国充满了敬意与期望。他认为革命派必须毫不妥协地坚持共和国，因为这是防止君主专制复辟的有效办法。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他告诫革命党人要警惕袁世凯之流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阴谋诡计，指出要防止袁世凯用君主立宪制来作为实行君主专制的工具，要始终坚持民主立宪的共和制，要使新中国掌握在真正的中国人手中，而不能让他落入欧洲掠夺者和叛徒的手中。他呼吁革命同志们紧密团结起来、团结得要比亲兄弟还要紧密，否则内部的纷争和内战“定会招致外国的干涉，这意味着瓜分这个壮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帝已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②。可见，到了晚年，他把建立和坚持民主共和国当作革命的首要任务，当作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

容闳所处的中国近代史的前八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进程逐渐加剧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空前激荡的时期。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振兴中华，曾先后在这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壮剧。他不同于他人的显著特点，是他的思想能始终跟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向前发展，他提倡向西方学习，坚持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救亡图存，以及他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构成了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他的思想的主流部分。

作为一个在特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政治理论缺乏深度和系统性，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和方案往往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很难适应中国的国情，因而使它们的影响和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他对西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希望能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使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而富强起来，然而结果却总是与愿望相违；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达官显贵们身上，最终都在显贵们的破坏下失败了。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缺乏力量、缺乏经验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作为一位爱国华侨，维新思想的先驱，和“西学东渐”思想的首创者，容闳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他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输入中国，使中国渐趋于文明富强之地”^②的目的渐得实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曾给中国带来新曙光的人。

注释：

①③④⑦⑧⑩⑪⑬⑭⑮⑯②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⑥⑫戴学稷、徐如：《容闳年谱简编初稿》暨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一）

⑤朱士嘉《美国迫害华工史料》第60页

⑬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页
（下转第13页）

主义的宏伟事业中来。”为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采取疏通引导的方针，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促使矛盾转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运用社会舆论的力量，造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注意思想动向，把工作做在前头等科学方法。只要方针正确、方法对头，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能够成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好形式。

参考文献

-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2页
- ②刘少奇《论党》第16页
- ③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④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⑤《邓小平》文选第232页
-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07页
-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7页
- 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56—457页

.....

（上接第42页）

- ⑩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第114—115页
- ⑪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页
- ⑫《1910年3月28日容闳致布思函》《布思文书》，转引自袁鸿林《容闳述论》
- ⑬谢缙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